



广阔乡土的行吟者

——王小忠文学创作中的甘南经验

□马云霖

不论何种文体,王小忠的创作始终以故乡甘南为坐标,通过对甘南农牧区景观与生活的在地体认,图绘甘南农牧民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本相

甘南藏族作家王小忠以多种文体展开自己的丰富创作实践。他的文学版图横跨诗歌、散文、小说及儿童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散文集《兄弟记》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其创作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得益于多文体创作的深厚积淀,王小忠的散文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跨文体特征,既有小说般生动鲜活的叙事脉络,又兼具诗歌的抒情性。在叙事与抒情之间自由切换的散文创作方式,不仅丰富了其文本的表现维度,更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不论何种文体,王小忠的创作始终以故乡甘南为坐标,通过对甘南农牧区景观与生活的在地体认,图绘甘南农牧民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本相。

河流书写与流动的美

作为连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甘南不仅汇聚了雪山之巍峨、草原之辽阔、河谷之深邃、湿地之灵秀等多元地理景观,更形成了以苍鹰、牦牛、格桑花、凹舌兰等为代表的独特高原生态系统。从瞬息万变的高原气候到生生不息的游牧文明,这种丰富而立体的自然人文景观,为王小忠等甘南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们作品中那种既雄浑壮丽又秀丽坚韧的美学特质,正是这片土地自然灵性与人文底蕴的文学映照。

在王小忠的文学创作中,河流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文脉络,更是他观察和书写甘南的重要美学视角。通过对河流这一自然景观的深度开掘,王小忠在其散文中构建起一个流动的叙事空间,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动态美学特征。在其以河流为主题系列作品《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中,他依托真实的行走经历,构建起以黄河为大动脉,以洮河、车巴河、冶木河等支流为毛细血管的创作版图,动态呈现甘南腹地农牧民生活面相。由此可见,这些纵横交错的河流网,是连通王小忠书写空间的重要支脉。

《黄河源笔记》中,王小忠主要以行走玛曲以及探寻黄河源的经历展开叙述,将阿万仓、木西河、欧拉乡、欧拉秀玛乡、卓格尼玛滩、采日玛、齐哈玛、花湖、尕海、若尔盖、唐克、曼日玛、久治、大武、门堂、阿尼玛卿等和黄河源密切关联的自然和行政区域相互勾连,完整呈现出其视野中的黄河源风景。《洮河源笔记》是深入生活、与洮河岸农牧民深度接触后的沉思之作,作品以洮河及其支流热乌河、则岔河、多拉河等水系为脉络展开叙述,不仅记录了洮河流域的自然风貌,更通过对农牧民生活的深度参与,展现出半农半牧区的真实生活。如果说《黄河源笔记》是作者对自然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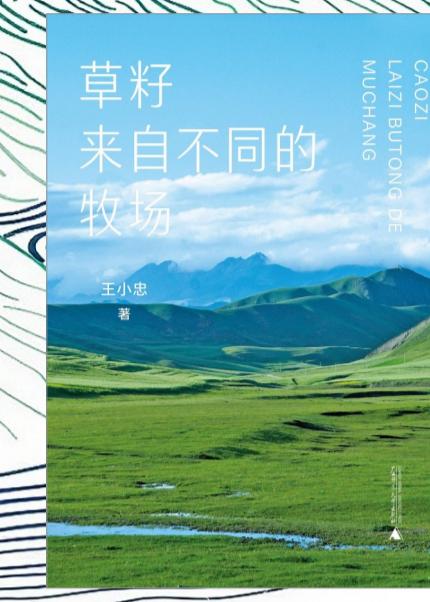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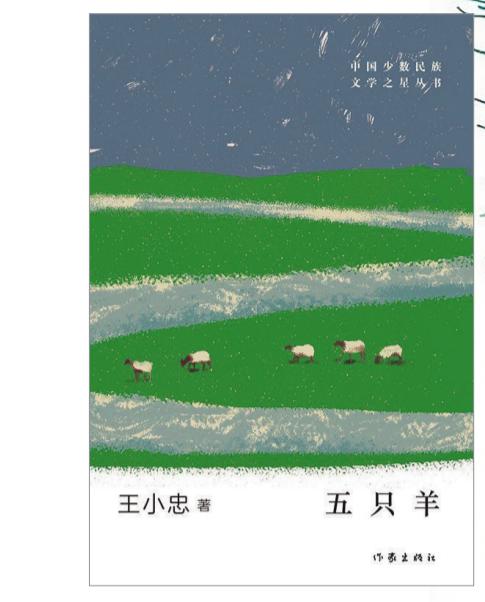
丽景观的赞颂,那么《洮河源笔记》则是对他洮河流域牧区与半农半牧区群众,在生活褶皱和文化纵深处的深度剖析。《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则是对前两部作品的延续与补充,显示出作者对甘南草原生态、生活、精神的哲理性思索。可以说,这三部作品就像流动的画卷,动态立体地展现了王小忠“文学甘南”的空间版图。

动植物是地理和气候的生物指示剂,也是生态观测的指针。王小忠在其作品中涉猎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种类,既体现出他以文字为甘南草原上这些在冰雪与寒风侵蚀下,依然顽强生存与繁衍的生命树立丰碑的意愿,也体现出他对甘南生态变化的深切关怀。尕海湖边的黑颈鹤、灰鹤、云雀、大天鹅、斑头雁、赤麻鸭、棕头鸥等在高原栖居的候鸟,就像野性的诗歌,以鸣叫打破草原的静谧;草原深处的忍冬花、龙胆花、红参、虫草、红花绿绒蒿、酥油蘑菇、马莲花、凹舌兰、珠芽蓼、鼠尾草等高原耐寒植物,则以其多种色调打破了草原的单调,给草原带来生机与活力。王小忠对这些坚强且充满韧性的动植物的深情书写,并未停留在生命的歌颂阶段,而是将其和生态、人生等命题相关联,进行深度思考。

对乡土文化的多重思考

王小忠笔下,甘南的民族地区景观不仅承载着他对于生态的关切、对大地的精神向往,也潜藏着其对乡土文化与乡土精神的追寻与反思。乡土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文化个性形成的重要支柱。因此,与乡土有关的作品中,常贯穿穿着对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等恒定伦理问题的追问与思索。作为土生土长的甘南本土作家,王小忠熟悉这片大地上的每一寸肌理,也深谙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人民的乡土神性。本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与怀恋,他以不同文体呈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和精神的变迁。

半农半牧的成长经历,使王小忠的创作深受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双重熏染。在其创作中,依据这两种文化不同的表达语境,形成了以“草原”和“村庄”为载体的不同叙事空间。两种文化空间在不同文本中自由切换,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叙事维度,更构建起一个兼具农耕文明深度与游牧文化广度的独特文学世界。长篇叙事散文《兄弟记》以个人成长经历为原型,系统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甘南农区生活史;小说集《五只羊》则以班玛草原为主要叙述空间,展现现代化对牧区传统文化的冲击;以行走轨迹为线索结构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则以河流为主线,系统而微观



《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王小忠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十月

地呈现现代化进程中河源附近农牧民的生活全貌。可以说,王小忠以甘南农牧区生活为原型的系列著作,通过游牧和农耕两种文化基因的有机融合,构成了一部甘南农牧区乡村乡情的变迁史。

王小忠的创作表现出一种既遵循现实主义传统、又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特色。在《铁匠的马》《缸里的羊皮》《羊皮围裙》等作品中,王小忠以铁匠、皮匠、银匠等草原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匠为主人公,反映以班玛草原所代表的牧区传统工匠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衰微的残酷现实;《夜如铅》《凶手》《黑木耳》《五只羊》《金手指》《车巴河纪事》等作品是对农牧民尝试发展牧区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多维呈现;《虚劳》《兄弟记》等篇目,则是作者生活与心灵的“自叙传”,他以感伤、纤敏的情感,叙述他所切身体验过的乡土生活。此外,小说《虚劳》《谁厉害》以及“行走”系列散文又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反思意识。《虚劳》中一生追求心灵善良与慈悲的母亲与无法摆脱世俗名利的智慧长者形成对比,反思了金钱对人的腐蚀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

总体来说,以农牧区生活为主题的乡土生活经验,是王小忠创作的基底,这些作品中蕴含着他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反映出他对乡土伦理与乡土精神的追怀之情。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中,甘南这片承载着多元文化记忆的土地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面对断裂的传统和未知的未来,这里的民众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建立起

新的乡村秩序?这是王小忠基于个人感受对乡村命运的在地思考,是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深情关切。乡土精神的“复魅”,或许就是王小忠对这些问题所能给出的最好回应。

鲜明的“作者在场”意识

王小忠的创作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作者在场”意识。散文作为离作者最近的文体,从中可以最直观地窥见作者的心灵和情感。在《兄弟记》《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等带有民族志书写风格的纪实散文中,王小忠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表现出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三者身份的高度统一。文本内的叙述者与文本外的作者,在成长经历、人格品质与思想意识等方面形成互文性关联,在虚实之间扩大了文本的表现张力。同时,作者地位的升格,使其文本兼具叙事的客观性与情感表现的真实性,在叙事与抒情层面展现出“双重真实”的美学效果。

《兄弟记》是系统展现王小忠人生经历的长篇叙事散文,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概述性地呈现作者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对故乡、亲情、友情、生命等诸多命题的思考。《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则是他人生经历的片段化呈现,涵盖他在玛曲、治木河岸教书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在洮河边驻村的真切体验。这些记录了九甸峡水库、移民搬迁、牧区农家乐、民宿

兴起、牧场固定、传统手工艺衰落等社会事件的文本,和作者的人生经历互为注脚,勾勒出大时代背景下作者个人的成长史和心灵史。

小说集《五只羊》则通过真实的地理空间与强烈的反思意识,体现出作者的在场。小说《虚劳》中的母亲,和散文《洮河源笔记·祥云》及《兄弟记》中的母亲在身份、个性、命运等方面都有某种重合,在不同文本的碎片化书写中,一个受多民族文化影响,虔诚、朴实、任劳任怨的母亲形象逐渐拼凑完整。可以说,这一形象既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写照,又是西北地区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是王小忠的母亲,也是西北千千万万个普通母亲形象的缩影。

作者身份的升格,还导致叙述者在文本中可以随时插入自己的评论或反思,对社会现象的适时评论和对人生或生命意义的叩问,使平铺直叙的叙事有了更深维度的延伸。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AI以凶猛势头快速渗透各行各业,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也不例外。在文学创作的外在形式能够被AI模仿与超越的当下,作者的个体经历和自我知觉等感性经验就显得弥足珍贵。期待这位甘南草原的行吟者,在今后的创作中能进一步突破窠臼,一方面在形式上大胆创新,探索更契合自己思想的书写形式,另一方面继续扎根甘南大地,深度开掘这片土地深处的生活本相与灵魂底色,让其文字成为折射甘南草原肌理的棱镜。

(作者系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文学院博士)

■评论

用真诚的文字嵌入故乡

——陈永忠小说集《稻花鱼》读后

□姚 瑶(侗族)

侗族作家陈永忠的小说集《稻花鱼》近期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20万字的小说集由16个短篇小说构成,多篇目在《民族文学》《广西文学》《西部》等刊物上发表过。近年来,陈永忠主攻短篇小说,短短几年间取得不菲的成绩。从我阅读的部分文本来看,他的作品以故乡黔东南现实生活为创作背景,文本具有独特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乡土文化底色,为读者呈现了黔东南之美。从集子里的《山那边水那边》《花开的寨子》《开秧门》《鸭客》《落宿谷》《风雨桥》《稻花魂》等来看,标题上都带着强烈的地方性,他用文学的方式讲述苗侗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息,构筑属于故乡地方性的文学天堂。

同题小说《稻花鱼》以侗族乡村为叙事空间,书写稻花奶奶、公公与阿朵三代人的生活交织,洋溢着浓郁的民族和地域风情。阿朵用手机直播的方式记录公公和稻花奶奶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故事,作品为读者呈现了黔东南特色的苗侗婚俗、稻田养鱼、酸汤美食、斗牛等文化元素。作者笔下的民间生活、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所勾勒出的乡土,有韵味、有温情。他以“稻花鱼”为核心意象,将农耕文明、民族记忆与个体命运融进文字,是对故乡消逝挽歌式的书写,也是对故乡烟火的深情回望。在缓缓推进故事情节的同时,他引导读者对乡土文明的转型进行深入思考。

我一直认为,故乡的地方性是作家思想的出发点,那一块胞衣之地藏着无限可能的文学富矿。刘志华在《文学地方性:贵州三代作家创作管窥》写道,蹇先艾的风俗小说以田园牧歌的情调,在怅惘、忧郁的情绪中向读者展示出“老远的贵州”那种前现代的生活;何士光笔下的“梨花屯”世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乡土变革的诗意审视;欧

阳黔森书写乡土传奇与村野生活,带给读者的是对这片土地厚重历史与当代生活的体认。三代作家选择用地方性元素,通过文学的方式讲叙贵州近百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他们的文本展现了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理念,进而建立起丰富的精神内涵。

在阅读这部小说集的过程中,《鸭客》和《半边月》让我记忆深刻。陈永忠生活在黔东南,写的就是他熟悉的乡愁、故乡的田坎、故乡的人物,他试图在文字里建立属于自己的精神版图。在他笔下,鸭客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个即将消失的行当拉近了我与作者的情感距离。日夜浩荡东去的清水江,诞生了无数鲜活的故事,此刻不急不缓流入我的心里,让我久久难眠。

“那次,他们款起来很投缘,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于是,就在堂屋结拜了兄弟(当地叫打老虎)。”“款”是带着独特地域特色的方言,我们常说款天,就是吹牛的意思。“打老虎”也带着浓郁的地域特色。他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侗语方言(如“恁个早”“背时的”),使文本更具地方性。

“鸭客住的寨子叫冷水寨,那里有养鸭的传统,家家户户都养,人们养的鸭叫三穗鸭。为什么叫三穗鸭?鸭客与主人喝过两杯之后,卖起关子来,不直接讲鸭,而是讲冷水寨种的稻子可不一般的稻子。一年秋天,有人在一块水田里发现一株禾苗居然抽出三穗穗子,真是奇怪。”他在这里巧妙呈现了地方性文学书写的精彩。

作家笔下的历史、现实、文化、故事、语境,往往与作家生长的这块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评论家谢有顺曾说过:“在全球化时代里,文学就是强调地方性。”地方性的存在让中国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地方”的视角,一个小说或许会乏味得多。方言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地方

(作者系作家)

《水的复数》是纳西族作家黄立康新近出版的一部散文集,由“奇数”和“偶数”两辑组成,收入《翅膀之歌》《水的复数》《城市猜想》等10篇散文佳作。散文集以文化大散文的话语方式,对历史与文化进行回望与书写,但又不局限于对宏大历史的打捞,亲切的生活细节以及个体幽微的生命体验渗透在整部作品的字里行间。

纳西族的璀璨文化和丽江大地的瑰丽多姿,是黄立康散文创作的灵感源泉。一颗“纳西之心”在黄立康文字的肉身里跳动着,让他的散文有了饱满的血肉和筋骨。《水的复数》写纳西民俗和丽江风情,但黄立康的写作不是为民俗而民俗,更不靠哗众取宠的民俗与风情描写来博取读者眼球。黄立康写纳西族的生活,也写其他民族的生活,散文集从更广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出发,呈现多民族相互依存、影响与融合的关系。《河口的云》写河口苗族的生活以及一位苗族母亲的生命故事。河口不仅居住有苗族,还有瑶族、壮族、傣族、汉族、布依族、彝族等,大家一起居住、劳作、交流,这是云南日常生活的本来面貌。

黄立康的散文有画面感,写作节奏张弛有度,隐藏着他自身民族的“文化密码”。他的散文既吸收了纳西族丰厚的文化元素,也融汇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滋养,是民族文学创作的一次拓展。

黄立康早年写过诗,诗歌创作对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黄立康将诗的创作手法与技巧糅进散文创作,或直接在作品中插入原创诗歌,或引用恰切诗句夹叙夹议,精准表达当下的写作情境与内心的复杂情绪,从而使整部作品有了如诗一般跳跃、灵动、丰富的内蕴和张力,遣词造句、段落布局以及整体的文风构思,都流露出鲜明的诗化特征。

黄立康散文中的诗性,尤其体现在他对意象的营造与重视上。意象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元素,黄立康将其精巧运用在了散文写作中。路、水、雪、树、云等一系列意象散落在作品中,准确灵动地传递出黄立康对天地自然、人性命运的深入思考。黄立康以自己对世界的细腻观察,用形象又恰切的意象绘织出自然的广博与云南的瑰丽,勾勒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成长,叩问更为本质的生命存在。

《翅膀之歌》是整部散文集的开篇之作。文中黄立康以“路”这一本身就容易给人蜿蜒感与变化感的意

象,向读者诚恳地袒露自己的成长之路。“小路”串联起他的人生之路,从故乡的乡村小路到昆明求学的龙泉路、丽江古城的福慧路,再到北京学习进修时走过的路,读者能够看到一个纳西族青年成长的足迹,一条又一条“小路”引领他从香格里拉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同名散文《水的复数》充分调动“水”的灵动多变,摹写大地上的山水形神,诉说人对广袤自然的敬畏。《独钓人间雪》记叙了父亲人生的曲折多变,以树的意象隐喻人与命运的复杂纠葛和血脉亲情的复杂关系。

黄立康散文中营造的意象不是空泛的,而是沉淀了作家的生活趣味与生命觉悟,是感性、理性与智性相结合的诗意存在。审美意象的创构,一方面使得黄立康的散文在抒情时带入主体性的生命体验,强化了写作主体自由心性的抒发与展示,另一方面也使黄立康的散文写作呈现出明显的跨文体特点,让散文充盈着诗化特征。

《水的复数》之所以耐人寻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黄立康的写作有一重“向内转”的审美境界。《水的复数》写山川、时间、云朵,写人间烟火和寻常人生,但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事物与生活的表层,而是向人的精神世界深处挺进,探照更为本体的存在。

收入《水的复数》的散文,从篇幅看都是有一定体量的万字左右的大散文,但读来又不会给人冗长乏味之感,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的叙事、议论和抒情,不空洞、不造作、不矫情。恰恰相反,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让人感觉熟悉与亲切的日常气息。《水的复数》中绝大多数的写作素材都源于作家切实的生活经历,它们是黄立康外出旅行时的所见所闻,是他看过电影中的人物,是他家人与朋友的生命经历等。在黄立康的文字引领下,历史和现实纵横于时间之网,构成一幅立体多元的日常生活画卷。

黄立康的文字真正要探究的,是面对高速发展的时代,具体的人该何去何从,精神世界日渐荒芜的现代人,如何从委顿的存在困境中超拔出来。生命如何才能够开创出更具可能性、可塑性的未来?黄立康给出的建议是“关注当下”。作家通过深沉的目光和飞扬的情思,去直视与靠近更为本质、更为幽微的生命存在,探究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